

抗战时期“新知识分子”与中共军队干部^{*}

谢 敏

内容提要 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非“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新知识分子”加入后,受工作能力、经验资历等因素的影响,大多只能从事基层政治工作,这导致了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冲突,进而触发了整风在军队基层的开展。中共一方面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在严肃地批评知识分子的“小资产阶级意识”,另一方面也无法全面贯彻阶级话语的原则,更多是根据现实需要在这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阶级话语在此一时期隐而不彰,不在中共干部任用中起决定作用,这是与具体实践互动的结果,也符合中共自身“知识化”、“技术化”的需要。

关键词 抗日战争 中共军队 新知识分子 政工干部 工农干部

抗战时期,中共军事力量迅速发展壮大。学界多关注这一现象的成因及其对随后国共内战的影响,较少具体分析军队扩张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实际问题以及中共自身的应对。军队建设的基本问题是“人力”与“财力”。对一个在野革命党而言,要在多种势力竞争的敌后根据地大规模征集“人力”、“财力”以扩军,其过程之艰辛不难想见。征兵不易,求将更难。就中共军队而言,政治工作是其独具优势的利器。军队政治工作的有效开展,有赖于一大批素质优良的政工干部。而军政干部的双重配备,导致中共军队对干部的需求更超过一般军队。

民国时期曾有三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第一次是北伐时期大批知识青年南下投奔国民革命军;第二次是抗战初期大批国统区知识青年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第三次是抗战末期国民政府发动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抗战初期投奔延安和抗日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有相当一部分被分发到军队中充任政工干部,正好迎合了中共扩军对政工干部的大量需求。这批“新知识分子”^①是中共抗战扩军过程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然而问题并非只是“投奔—吸纳”那么简单,亦非“抗

* 本文曾先后得到匿名评审专家及《近代史研究》编辑部的批评指正,谨此致谢!

① 本文中的“新知识分子”主要是指抗战时期参加中共革命的知识分子,系中共按时间和成分加以界定的概念。不过,该概念并非高度同质,实际包含了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来源、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仅就文化程度而言,除少数作家、学者和大学生外,绝大多数是初、高中学生,甚至是小学生(包括初小、高小)。所以,中共有时也用“中小知识分子”、“半知识分子”来指称这一群体。在整个干部队伍结构中,他们多处于执行和贯彻政策的层级。文化程度“下层化”,所居职位“下层化”,是他们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一些有关中共干部代际构成的表述和认知中,他们也多被称为“三八式”一代。

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宏大话语所能充分解释。其间既涉及中共阶级路线的宏观调整,也面临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干部以及文武、新旧干部之间的磨合与调适。本文试图从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互动的角度,去理解“新知识分子”在中共军队中的权力分布和生存实况,探讨他们在军队建设中解决了什么问题、又引出了什么问题,进而对知识分子在整个中共革命道路中的实际位势有所揭示。

一、“缺乏干部”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

随着抗日局势的日渐严峻,中共在抵达陕北后举起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有论者指出,统一战线的真正意义“不在于同国民党的有意义的合作,而在于它对共产主义革命战略的影响”,因为中共可以利用它来使自己成为“真正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①在中共眼中,统一战线并不意味着“削弱红军”,相反,“红军的强大和巩固、红军中工农成份的保障、红军中党的领导的加强,是统一战线的策略顺利执行的先决条件,和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②国民党自然也有利用统一战线削弱红军、使自己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者进而建构自身政治秩序的意图。所以,统一战线的确立有赖国共双方的妥协,而中共军队的存在形式和数量便是争议的焦点之一。国方要改编中共军队并极力压缩其数量,共方一定程度接受改编但想力保军队的数量和对军队的自主控制。抗战开始后,中共并未受制于相关条文对军队数量的规定,而是指示八路军在各地努力以“合法名义”扩军。1937年10月,八路军总政治部规定在两个月内扩大部队1.2万人。^③实际上,两个月扩大了两倍多,从约3.4万人扩大到约9.2万人(新老在内)。^④中共扩军基本是从1937年10月开始的,11月太原失守后尤为积极,但因经费、枪械等限制,12月底便停止了。任弼时曾豪言,如果经费、武器问题能够解决,八路军再扩大10万人,在1938年年底即可以完成。^⑤

扩军过程中,政工干部大多忙于扩军工作,部队的政治工作一度受到削弱。119师后来的总结报告说:“由于当时政治工作的力量几乎全部用在发展方面,所以师旅团政治机关撤散了,部队特别是老部队的政治工作受了很大的损伤,某某部分的原有基础也开始丧失。”^⑥急速扩军导致兵员成分复杂,再加上在残酷的战争环境下,一度采用“欺骗、利诱、收买、强迫”等手段,导致了贪污腐化、军纪松弛、叛变逃亡等诸多问题。以晋察冀军区为例,从1937年11月军区成立到是年年底,“部队中发生了普遍的严重现象,不断的逃跑(除四分区外共跑了一百四十八个,一支队就九十六个,二支队整连整班逃跑,一支队广灵游击队一排叛变,灵丘九个队叛变,十一大队曾一部叛变),扩大私人势力,拉拢勾结,脱离群众的军阀主义、土匪主义(一支、一团、一连,多不等),以及农民的保守与报复观念,极端民主化,游击主义等等严重的倾向。”^⑦

① [美]詹姆斯·R·汤森、[美]布兰特利·沃马克著,顾速、董方译:《中国政治》,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55页。

② 《总政治部关于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1936年12月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解放军出版社2002年版,第617页。

③ 《独立自主地动员与领导群众》(1937年10月27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编:《周恩来军事文选》,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51页;《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部队进行地方动员工作的指示》(1937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八路军·文献》,解放军出版社1994年版,第88页。

④ 任弼时:《关于八路军情况向中央的报告》(1938年2月18日),《党的文献》1994年第2期,第16页。

⑤ 《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与中国共产党的工作和任务》(1938年5月17日),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任弼时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97页。

⑥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总结报告》(1940年5月24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219页。

⑦ 舒同:《几个月来部队工作的总结与今后工作方针》(1938年4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史料丛书编审委员会、中央档案馆编:《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1册(文献选编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147页。

急速扩军还导致军队干部供不应求。聂荣臻回忆抗战初期的情形说：“根据地的创立，所属部队的扩充和发展，提出了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缺乏干部。四面八方都说‘要干部’，没有干部也硬‘要’”；“在我军大发展的形势下，到处都缺乏干部，就是后方有干部，当下也不能插翅飞来”。^① 据林彪1937年11月30日给中央的电报，115师“按现编制四个团，缺少团长三，营长三，付〔副〕营长二，连长八，付〔副〕连长十二，排长卅四，团政委一，团政治部主任二，团特派员三，指导员四，师政治部主任一，部长一，科长一，组织部长一，民运部长一，抗敌部长一。两个旅的政治机关因原来无此组织，故现在毫无基础。故两个旅的政治部人员全无，两个旅均无付〔副〕旅长。徐海东旅之参谋长亦调走，师部则缺第二第三两科长及师参谋处长”；“师政治部除罗荣桓、肖向荣主要干部外，组织部民运部全无一，宣传部只有肖挺梓，宣传队全系新招来的”。^② 再加上115师入晋作战以来干部伤亡大，随军教导营培养的干部还要大量输出，致使干部特别紧缺。舒同描述晋察冀军区初期的情形说：“饲养员一跃而为营政委者有之；特务员支书一跃而为队长团政治主任者有之；党龄才两天即任营教导员者亦有之。”^③

华北如此，华中也不例外。据马苏政回忆：

先遣队（粟裕率领的新四军抗日先遣队），以及不久后合并成立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是人少、枪少、干部少。人少不要紧，参军热潮正一浪高一浪；枪少也不要紧，组织起来向敌人手中夺取；唯有干部少，真叫人着急。有了人就需要有干部。要由干部去组织训练，指挥战斗，把仅有抗日热情的青年群众变成有纪律、有军事素养、有高度觉悟的革命战士。但那时，有的连队仅有连长一人主持全连工作；有的连队因没有指导员，政治工作及带事务性的工作，只有让文书来进行；再加上频繁的战斗，基层干部伤亡又大。^④

自中央发布“华北巩固、华中发展”的指令后，大批干部输送到华中，仍然是“杯水车薪，何济于事”。^⑤

政工干部较之军事干部更为缺乏。军事干部重实战经验，可在战争中养成并逐级提拔，较容易得到解决。而政工干部则需具备一定的知识文化水平，非短期所能培养。关于政工干部缺乏的严峻程度，罗瑞卿于1938年11月有过如下描述：

在今天，我们抗战军队中的实际情况，干部的问题还成为极端严重的问题。这表现在我们许多抗战的军队还根本没有政治工作的干部，所以确立政治工作的问题，一直到现在也只能成为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某些我们抗战的军队，虽然已经有了一些政治工作的干部，但要真正健强政治工作的组织，还是很多的不够。在全国抗战军队中，真正解决了政治工作的干部问题是不多的。此外，我们现在政治工作的干部中坚强而有能力的分子，自然颇不乏人，但不称职者恐亦非完全没有；而使用干部之不恰当、不合理的现象，据我所知，更是在许多的地方存在着。

① 《聂荣臻回忆录》中，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377—378页。

② 《林彪关于第一一五师干部情形致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电》（1937年11月30日），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199页。

③ 舒同：《晋察冀军区抗战三年来政治工作概况》，《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11期，1940年，第29页。

④ 马苏政：《粟裕同志在江南指挥部》，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编：《铁流——老战士回忆在新四军的日子》（1），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9页。

⑤ 肖望东：《斗争一年中的政治工作》（1939年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94页。

尤其抗日战争的持久性与残酷性,大批政治工作干部的消耗与牺牲,这是绝对不可避免而应当在我们的预计之中的,况且没有坚强而有能力的政治工作的干部,要确立政治工作在部队中的信仰尤为困难。^①

总之,急速扩军的结果,亟需加强部队的政治教育和管控,以及培养和“创造”大量的政工干部。虽然早在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中共中央就明确指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②,但直到抗战初期,“创造大批工作干部,加强部队政治工作”才“成为解决当前扩大工作之中心一环”。^③

中共一般通过开办各种教导队、随营学校以及军政学校来培养军队干部,要求各级部队从现职干部和积极分子中选送学员。但随着部队的急速扩大和战斗的伤亡,从部队中遴选学员培养干部的方式已明显不足,必须做出一些改变。红军时期,中共特别强调干部的阶级成分,重视干部的工人出身,而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提出和运用,其干部政策也在逐渐调整。1936年8月15日,共产国际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评中共“不加选择地把大学生和其他军队的〔旧〕军官吸收到红军中来,也是错误的”。^④同年8月20日,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则对“革命的知识分子、学生、小商以至农村中富农、小地主、白军退职失业的下级军官”更为宽容,不仅表示要“大胆吸收他们,欢迎他们来加入”,而且还要求“按他们的工作能力分别分配适当的工作”。当然,对“这些成分须注意考查和特别加以训练”。^⑤抗战爆发后,共产国际仍指示中共,“首先是从工人中提拔新的干部,这是党的最重要任务之一”。^⑥中共实际的干部政策则在悄然发生改变。如聂荣臻在晋察冀军区办一所短期的军政学校,对学员的要求就不再强调工人出身,“有适当的文化水平,就很好”。入校的学员“大部分是山西、河北的中学生和小知识分子,还有几十个是平津流亡的大学生”。^⑦

1939年,毛泽东于6月10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强调:“要保护革命知识分子,不蹈过去的覆辙”,“军队一定要收容大批革命知识分子”。^⑧紧接着,军委总政治部就发布训令:“吸收革命知识分子参加军队工作,成为目前干部政策上一个重要任务。”^⑨同年年底,毛泽东作出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认为许多军队干部恐惧甚至排斥知识分子是“没有注意到知识分子的重要性”的表现。^⑩军委亦随即指示,不仅军队要吸收知识分子,抗大及各军政学校也应“尽力就地吸收知识分子

① 《罗瑞卿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1938年11月),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356—357页。

② 《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瓦窑堡会议)》(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1935年12月25日通过),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21页。

③ 《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关于训练干部和加强部队政治工作的训令》(1938年5月31日),《八路军·文献》,第191页。

④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给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8月15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31—1937)》,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466页。

⑤ 《中共中央西北局关于扩大红军运动的指示》(1936年8月20日西北局常委会通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3册,第492页。

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决议书(书记处专门委员会的建议)》(1937年10月10日于莫斯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37—1943.5)》,中共党史出版社2012年版,第9页。

⑦ 《聂荣臻回忆录》(中),第378页。

⑧ 《反投降提纲——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报告和结论的提纲》(1939年6月),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33页。

⑨ 《总政治部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和培养新干部问题的训令》(1939年6月25日),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134页。

⑩ 《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及半知识分子加入为学生,深入政治教育,并应多多总结教育知识分子的经验,贡献给各个部队。”^①

在中共干部政策逐渐调整的同时,随着平津、沪宁等地相继沦陷,大批知识青年奔赴延安和抗日根据地,为中共调整政策提供了条件。中共趁机动员、组织和输送青年知识分子前往其开办的各所学校。

以“抗大”为例,1938年至1939年可谓其发展史上的黄金时期。据陈云说,即使“抗大”一度在武汉登报申明不再招生,仍旧有大批知识分子“络绎不绝地来,没有汽车用两条腿走,男男女女从几千里外都来了”。^②“抗大”第五期(1939年1月28日至1940年1月1日)是吸收外来知识分子最多的一期,共招收学生4962人。^③

当时国、共、日各方都在“抢”知识分子。陈云曾不无忧虑地表示:“国民党在抢,我们也要抢,抢得慢就没有了。”^④除了国民党,日本也在“拼命地与我争夺知识份子”,这是“目前放在我们前面一个最大的危险”,因此,“要破坏日寇汉奸的这种阴谋,吸收广大的知识份子参加到抗战中来,是一个严重的政治任务”。^⑤1940年,“抗大”在新四军中开始成立分校,沪、宁、杭等地的知识分子纷纷投奔。中央军委指示各部:“大批收容知识分子,只须稍有革命积极性者,不问其社会出身如何,来者不拒,一概收留。”^⑥这些被感召和“争抢”而来的知识分子是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干部的一个重要来源。

二、“新知识分子”与军队政工

在中共的表述中,一般将“抗战开始”作为划分新老干部的标准。自抗战开始后,新干部的数量确实大幅增加。据总政治部1940年的总结报告,“抗战前我们排以上干部只不过一万一千左右”,“现在我们有排以上干部约五万一千人”。^⑦新干部占干部总数的80%。

从三大主力师的情况看,1939年年底至1940年的统计显示,115师排以上干部中,新干部占52.8%;^⑧120师干部中,新干部占56%;129师指挥人员、政治人员、工作人员中,新干部分别占各类干部总数的56.46%、55.1%、82.74%。^⑨这些数据与前述“80%”存在较大出入。考虑到三大主力师以外各部队的情况,这种出入或许能得到一定程度的理解。因为在新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比重往往会大出很多。如1941年的统计,115师老干部占32.9%,新干部占67.1%;129师老干部占32.1%,新干部占67.9%;而在晋察冀新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比重则高达85.11%。新四军中新建部队多,新干部比重也甚高,达到了84%。^⑩

1942年,随着“精兵简政”的实行,大批老干部被抽调入校学习,再加上战斗伤亡,军中老干部

① 《军委关于军队吸收知识分子及教育工农干部的指示》(1939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14页。

② 《论干部政策》(1938年9月),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3页。

③ 《抗大大事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史》,国防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532页。

④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181页。

⑤ 胡克峰:《论知识分子在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山西省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5—6页。

⑥ 《毛泽东、朱德、王稼祥关于大批收容培养知识分子为建根据地之用给新四军的指示》(1940年10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494页。

⑦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665页。

⑧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1940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309页。

⑨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194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61页。

⑩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总政治部干部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867页;《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194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451页;《晋察冀军区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一年干部工作总结》,《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537页;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1942年9月),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893页。

进一步减少。如115师新干部比1941年春增加约5个百分点,达到了72.7%。^①

总体而言,抗战时期中共军队中新干部逐年增加,新干部的比重大约在55%—85%之间,而新建部队中新干部的数量远超主力部队。

关于新干部的来源,据陈毅的说法,大约可分为“青年知识分子干部”和“根据地减租斗争中加入革命的工农干部”两类。^②事实上,新干部的来源比陈毅所说的更多,成分更杂,除了知识分子和工农,还包括土匪头目、联庄会首领、旧军人、商人、地主等。不过,最主要的还是知识分子和工农。表1显示的是1939—1942年间中共军队排以上干部出身成分的总体情形(不分新老)。

表1 排以上干部成分比率统计表

(%)

部 队 \ 成 分	工人	农民	学生	其他
115师(1939.12)	19	58.7	14.8	8.1
129师(1941.6)	53.7	19.1	27.2	
新四军(1941)	14	52	34	
新四军3师(1942.2)	14.75	44.61	30.48	10.15
115师(1942)	12.52	42.65	31.89	12.94

资料来源:萧华:《关于干部问题》(1940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310页;《干部成分统计》,《第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194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452页;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194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893页;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1942年2月),《新四军·文献》(3),第423页;《现职干部出身统计》,《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1943年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864页。

说明:1.“部队”一栏中的时间反映的是该部队当时的干部情况。2.115师1939年12月各类干部比重总和略超100%,系源数据如此。新四军3师各项总和不到100%,系笔者统计时四舍五入所致。3.“其他”成分中也包含一定数量的知识分子,特别是129师,“半知识分子”更是占其中绝大多数。4.新四军34%的“学生”成分,源资料的表述是“小资产阶级及其他”,按源资料上下文及中共习惯表达判断,“小资产阶级及其他”与“学生”代表的人群几乎一致。

囿于资料,上表所列是不完全统计,未能涵盖整个中共军队以及整个抗战时段。从表1数据看,农民居首,学生次之,工人居第三位。而中共在表述时,仍不忘强调“工农的骨干作用和主体地位”,时常会将工人、农民放在一起统计和表述。这样一来,工农成分就排在了第一,学生次之。据总政治部1940年的总结报告,“不论新老部队排以上干部总的方面都保持了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工农成分”,新的知识分子“占全体干部总数的百分之十八至二十”。^③而从表1看,1940年以后,工农出身的干部比例再也没达到70%,而是持续降低,到1942年,基本降到50%的水平,而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的比例则增加到30%以上。抗战以来,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间,只有知识分子干部在整体上保持增长势头,与新干部的增加存在一种正比例关系。这意味着军队新干部中知识分子干部占有很大的比例。方强就曾说过:“在新的来源中,以革命知识份子出身的新干部占着主

①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867页。

②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夏),《陈毅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66页。

③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667页。

要的地位,这是八路军干部问题上划时代的一件事。”^①

据总政治部的报告,这些新知识分子“绝大部分是做政治工作”;“政治工作上又以宣传教育工作的为最多”;“其次是技术部门的工作”,特别是“各种秘书与文书”,“差不多最大部分都是新吸收的知识分子”;“做军事工作的也有一些,不仅是新部队有新知识分子的军事指挥员,就是老的主力兵团也有一些”。^②钟期光的回忆可资佐证,他说:“经过专门培训的知识青年,视其表现与特长,分别充当各级骨干,或到连队担任正副指导员,或到服务团从事文艺工作,或到营连担任文化教员,或到政治机关担任干事。当参谋,当医生,当会计,当报务员和机要员的,也非常之多。”^③

从129师1941年上半年的情况看(见表2),大约67.78%的知识分子从事政治工作,大致符合上述总体描述。单就该表所缺乏的冀南各部的情况而言,其在大批发展之初,新干部中“担任政治文化教育、扩军、民运工作的占95%”;1940年部队整编后,班以上政工干部的87.82%仍然是新干部^④;这些新干部多数是知识分子。在新四军第3师中,知识分子在政治干部中也占到了80%。^⑤冀西游击队是一支知识分子比重较大的部队,其领导人杨秀峰本身就是大学教授,当它发展到2000人时,内有300余名知识分子,多数都是连队政治工作干部。^⑥

表2 129师知识分子职别及数目统计表(1941年6月)

数 目	职 别						
	指挥员	政治人员	供给人员	卫生人员	杂务人员	工作人员	其他
	165	690	47	21	12	62	21

资料来源:《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194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461—462页。源资料中将“供给人员”47误写为417,“工作人员”62错加为64,“其他”21错加为20,此处均予改正。

说明:此数字缺冀南部队各旅,各分区及5旅13团,其余全部不缺。“其他”包括技术人员等。

中共在使用干部时,一般会配备“有党群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干部,主持部队的政治工作和参谋工作”。新四军第5师就是这样做的^⑦,115师也不例外,“仅政治部就有一二十名高中生和大学生,如敌工部长黄远是复旦大学高才生;大众日报社长陈沂毕业于天津大学;还有宣传部的阎遐、李毅、潘也如、康矛召、曹炳衡、那狄、陈楚;组织部的朱异羽;民运部的李青、靳怀刚、樊鹏飞等。他们那时都不过二十几岁,思想敏锐,朝气蓬勃,工作积极性很高。”^⑧中小知识分子在指导员中更是“占着相当大的数量”。^⑨

当越来越多的新知识分子参加到政治工作中来以后,政治工作各部门得到充实,政治工作的范

① 方强:《八路军干部问题在抗日战争中的特点》,《共产党人》第17期,1941年4月,第13页。

②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675页。

③ 《钟期光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版,第106页。

④ 《第一二九师关于抗战四周年组织工作总结》(1941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450、451页。

⑤ 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1942年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3),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423页。

⑥ 中共河北省党史资料征集编审委员会、太行(河北部分)史料联合征编办公室编:《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河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页。

⑦ 李先念:《关于编写五师战史和鄂豫边区革命史的几个问题》(1982—1983年),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新四军第五师抗日战争史稿》,湖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3页。

⑧ 李镜:《儒将萧华》,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364—365页。

⑨ 《一九四二年的政治工作总结与一九四三年的政治工作任务》(1943年1月),《罗荣桓军事文选》,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围也随之增加。这不仅改变了部队中军、政干部的比例,也改变了部队中老干部从事军、政工作的比例。如115师1941年的统计显示,老干部做军、政工作的比例是3:1,到1942年,老干部被大批提拔做军事工作,以致2旅老干部做军、政工作的比例变成了5:1。^①这样一来,大致呈现出老干部主要做军事工作、新知识分子干部主要做政治工作的分工格局。

新知识分子之所以会大量从事政治工作,最直接的原因应该是他们缺乏实战经验,不适宜直接指挥作战。在“抗大”等校毕业生分配工作时,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就电示,学生应“以先做政治工作为宜”,“熟悉八路军传统与生活”。^②其次,在中共的阶级谱系中,知识分子属于“小资产阶级”,不放心甚至反对知识分子的观念很难完全改变,故“不敢或不让新的知识分子干部做更负责的工作”。^③另外,与军事干部注重实战经验相比,政工干部更注重知识文化,知识分子干部自然比工农干部更适合从事政治工作。

表3 129师军事指挥人员与政治工作人员文化程度比较表(1940年5月)

(%)

职 别 \ 文 化 程 度	大学以上	高中	初中	高小	初小	识字	不识字
指挥人员	0.45	0.79	1.53	3.45	19.55	55.22	18.91
政治人员	1.95	5.89	11.46	14.76	27.58	34.39	3.97

资料来源: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194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61页。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级别的政工职位都被新知识分子包揽。新知识分子政工干部主要分布在营级以下。据粟裕回忆,1941年10月新四军第1师“营以下干部中百分之六十、连队指导员中百分之七十(以后占到百分之八九十),都是青年知识分子”。^④1942年太行军区的统计显示(见表4),在营连排三级政治干部中,新干部占86.71%;而在团级及以上政治干部中,老干部则占71.67%。王平在回忆冀中军区干部构成时也谈到,自程子华就任冀中兼第三纵队政委后,“中央从延安又派来一批红军干部,有周彪、帅荣、旷伏兆、李天焕、谭冠三等,到冀中各军分区、各团任政委或政治部主任”。^⑤

表4 1942年太行区新老政治干部级别分布表

新 老 \ 级 别	军区(师)	分区(旅)	团	营	连	排
新干部		8	9	89	706	151
老干部	3	16	24	41	95	9

资料来源:《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763页。

①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867页。

② 《毛泽东、王稼祥、谭政关于抗日军事政治大学毕业生工作分配与领导问题致八路军总部等电》(1939年12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267页。

③ 《关于干部工作的若干问题》(1940年11月29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214页。

④ 《粟裕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191页。

⑤ 《王平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页。

应该说,不论军事指挥员还是政治工作人员,老干部居上层、新干部居中下层,符合干部自然成长规律。所以,新知识分子主要从事军队下层的政治工作亦合常情。此外,团级以上各机关中的事务工作也多由新知识分子承担。比如,在129师5旅政治机关中,新干部占80.56%;在129师师部,新干部占79.52%。^①

其实,“新知识分子”本身也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包含不同文化程度、不同社会来源、不同职业背景、不同家庭出身的人。按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的划分,知识分子包括“贫苦知识分子”和“上层富裕知识分子”两大类,前者又可分为农村中的半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做过工作的下层职员、小学教员、下层贫苦的自由职业者,城市里贫苦的中学、大学学生三小类。农村半知识分子多充任班、排、连的军事指挥和文书、支书、政指;有工作经验的教职员等多经由一个时期的机关工作然后转到下层工作;广大的贫苦中学生、大学生则因他们较高的文化程度一般都在机关工作。^②如果这种划分确切的话,那么,营级以下的政工干部多数应是来自农村的半知识分子,机关中任职的则多来自城市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有社会工作经验的知识分子。

新知识分子大量挤在机关或仅仅充任文化教员、低级政工人员,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总政治部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示:“认为新知识分子只能作宣传、教育、文化娱乐工作是不对的”,“经考验过的政治质量优秀的份子,须抽调一部份加强机要部门的工作(如参谋、组织、除奸等部门)。”^③这说明当时党内、军内仍存有在政治上“歧视”新知识分子的观念。粟裕站在提高部队战术和战斗力的立场,批评了提拔军事干部时不注重知识文化水平的现象,并提议要“把一些有战斗经验的政治干部转变为军事干部”^④,隐约批评干部人事制度上有重武轻文的倾向。

以上只是对干部分布的总体描述,若细察之,不同的主力部队之间、主力部队与新部队之间、同一部队新团与老团之间还存在差别。例如,同样是新四军主力师,在老干部配备上,“三师过重资格,偏于老干部;四师过重才能,偏于新干部”。^⑤“在主力部队中,连级以下新干部占十分之九,营级以上则老干部占多数”;“在新部队中,团以下的政治部干部几乎全是新干部”。^⑥此外,老部队对知识分子的使用怀有戒心,新部队对工农干部的提拔不够诚心。如129师个别部队“有一时期根本不相信忠实可靠而出身知识界的分子”;相反“冀中有一时期没有着重的注意工农成分,形成知识分子的领导集团”。^⑦老团与新团也是这样,“在老团中连以上的干部都是经过长征的,排以下的干部一部份系抗战中提拔的。新团中排以下的干部新成份占了很大的数目。”^⑧

当然,这些差别程度深浅不一。新老部队间的差异应该是最明显的,曾引起过上层的高度重

① 《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194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764页。

②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1943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910—911页。

③ 《总政治部组织部关于新知识分子干部问题的指示》(初稿)(1941年12月1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516、517页。

④ 粟裕:《半年来工作总结及目前工作意见》(1942年11月),中共江苏省党史工作委员会、江苏省档案馆编:《苏中抗日根据地》,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191页。其实,朱德、彭德怀等人早就强调过,要从经历过实际斗争的知识分子中、从中上级的指政人员中提拔参谋人员等军事干部。朱(德)、彭(德怀)、左(权)、罗(瑞卿)、陆(定一):《关于加强与健康司令部组织及工作的指示》(约1940年12月8日),山东省档案馆藏,G001/01/0050/007。

⑤ 新四军政治部:《一九四一年新四军组织工作总结》(1942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6册,第894页。

⑥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194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61页。

⑦ 总政治部:《政治工作总结》(194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673页。

⑧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1940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303页。

视。1940年中央军委在关于干部工作的第一号指示中就强调说：“凡新部队其中知识分子干部很多的地方，要多注意提拔工农干部；凡老部队要多注意提拔知识分子干部。”^①该指示发出数月后，一向重视新知识分子的新四军第5师便开始“更加注意了提拔工农干部担任政治工作”。^②时任5师政治部副主任的王翰还因大量任用知识分子而“受到很多非议”。^③5师的这种变化，自然是揣摩中央军委平衡和调和两类不同干部用意的结果，因为“工人农民干部大多数向军事方面发展，知识分子多数向政治方面发展”，“结果会在工人农民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的使用上划下一条鸿沟”。但是，也应注意到，5师孤悬于鄂豫边区，知识分子干部的来源本就较其他根据地困难，可被吸收提拔的“差不多已经到了取之已竭的程度”，“只有大量的吸收工人和农民同志到政治工作部门中来”，才能解决政工干部的需求问题。^④可见，在干部任用上，实际情形和需要往往是重要的考虑因素。

关于中共军队中新、老干部的分布，周文青在1944年作过如下总结：“老干部——出身于贫苦的农民，过去‘红军’的残余，现在在中共军内，负着以下的几种职务：营教导员，团政治主任以上政工人员，连长以上的军事指挥人员，团政治处以上各级政治机关的组织人员锄奸人员，团供给处主任以上军需人员”；“新干部——出身于知识分子，他们担任着如下的职务：连级以下的军政干部，连队中的指导员，文化教员，各机关的工作人员，宣传人员，军事机关的参谋或助理人员”。^⑤日本方面也有类似的观察：

在部队干部中，虽然尚有所谓红军时代的较长党龄和军龄的人，但大多担任所属部队的领导干部。一般干部，则以事变后参加共军的知识分子占多数。由于这部分干部多属事变后仓促扩军中大量补充进来的，尚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在军事方面比不上有战斗经验的老红军，他们一般多为政治干部。指挥作战的干部概由有战斗经验的人充当。^⑥

应该说，虽然有大批新知识分子加入到中共军队的干部队伍中来，工农老干部仍然占据上层和要职。陈毅曾将抗战时期的干部分作5类，其中，大革命时期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是全党的中坚，处于掌握方针、决定政策的上层领导地位，多分布于军、师一级；工农老干部则多在旅、团负责。^⑦这正好印证了前文的分析以及周文青、日方的观察。由于经验和资历等限制，上层军政要职多由老干部担任，新知识分子只能大量从事部队中下层政治工作。

三、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

周文青认为，新老干部、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间的分别是“中共内部一个最大的矛盾”。萧向荣则认为：“工农成份是八路军的骨干，是八路军的基础，还是八路军在建军上的特点之一；但

① 《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的指示》（第1号，1940年10月28日），《八路军·文献》，第581页。

② 任质斌：《新四军第五师的抗战历程》，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第1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76页。

③ 韦君宜：《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8页。

④ 《关于大量提拔工人农民干部参加政治工作》（1941年9月5日），鄂豫边区革命史编辑部编：《鄂豫边区抗日根据地历史资料》（第2辑·政治工作专辑（一）），1984年印行，第132—133页。

⑤ 周文青：《中共军队实力的过去现在与将来》，《文化导报》第6卷第3—4期，1944年，第20页。

⑥ 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天津市政协编译组译：《华北治安战》上，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99—400页。

⑦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夏），《陈毅军事文选》，第266页。

八路军同时也吸收大批革命知识分子与青年学生参加到部队中来,并使其革命化与工农群众化,使其培养与锻炼成为八路军的干部,这是并不矛盾的。”^①但所谓的“不矛盾”实际上只是一种理想,或者说是想要最终达到的一种状态。

早在红军时期,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间就存在一种紧张关系。抗战时期,中共中央不断强调要吸收知识分子、创造知识分子干部,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许多工农干部掌权的军队仍“存在着恐惧知识份子甚至排斥知识份子的心理”,许多学校“不敢大量招收青年学生”,许多地方党组织“不愿意吸收知识份子入党”。^②不少部队(尤其是主力部队)一边抱怨缺乏知识分子干部,认为从抗大等学校输入知识分子远远不够;一边又对中央关于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指示不认真执行,甚至“采取怀疑敷衍的态度”。^③在干部提拔和分配时,一般需要对干部进行鉴定,可“翻开鉴定表来看的时候,可以发现这样的规律,即对老干部的鉴定一般是‘个性强’,对新干部(主要是知识分子)的鉴定一般是‘思想斗争精神差’,这正说明了一个‘老干部的压力’与‘新干部的不敢出气’的问题。”所以,提拔“总是在老干部中打圈子”,以至于一些老部队反倒像新部队,“感到干部缺乏(支部书记都难提出)”。^④即使有了新干部,也总是做出一些不恰当的分配,如让大学生在合作社当店员^⑤,或者永居文化教员职位。曾有一个知识分子,当过县长、游击支队司令,后到129师俱乐部当文化教员,一当就是3年,最后死在文化教员的任上。^⑥

当知识分子被分派来的时候,一些部队要么“送给人家”,要么“送回家去”^⑦,甚至直接退回去。当上级要求选送学员入校学习受训时,部队往往会将他们认为文化程度高的选送出去、文化程度较低但有很好品质的工农干部留下。^⑧表面看,似乎是干部培养偏重知识分子,实际却成了很多部队保留工农老干部、驱走新知识分子干部的借口。

部队排斥知识分子最极端的表现,是“形成所谓‘帮口’,知识分子即干脆插不进去”,或者是“插进去后,亦给你‘振了出来”。“曾经有过一个团,据说就振掉了五十多个知识分子,另一个主力团,知识分子今天还不能在营连立足,一律集中在团部,恐怕也是准备‘振’掉的。”“振走”知识分子的办法包括压迫、打击、“打岔子”、给人难堪等等。比如,“寻找他们的弱点加以嘲笑,在生活上虐待他们,‘逼其走路’。不问具体情形如何,就是照例不信任他们,使其永远居于文化教员的地位。如果表现不安,则又戴上一顶大帽子。”^⑨晋察冀军区曾经有一批青年学生,因为“有些老干部片面夸大他们的缺点,采取强硬打击方式”,结果“受不了,工作不安心,要求回学校”。^⑩

① 萧向荣:《八路军与知识分子》,《八路军军政杂志》第2卷第2期,1940年2月25日,第46页。

② 毛泽东:《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18页。

③ 周桓:《目前建军中的干部问题》(194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564页。

④ 《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抗战以来的总结报告》(1940年5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223页。

⑤ 《刘伯承、邓小平等关于干部问题的训令》(1941年10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502页。

⑥ 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6月8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856页。

⑦ 《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几个问题的报告(节录)》,《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870页。

⑧ 《晋察冀军区一九四〇年干部工作总结》(194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408页。

⑨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194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467页。

⑩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1943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925页。

一般而言,老干部因为多经历过长征,又多出身工农,政治上有着无上的优越感,喜欢在新干部面前摆资历、讲出身,仿佛“自己是经过长征的,放个屁也正确、坚决”,而新干部“立正稍息也犯自由主义游击主义军阀官僚主义”,“张口就是骂‘可耻的知识分子’、‘动摇的小资产阶级’、‘我们工农干部’”,于是使占多数的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自惭形秽,“出身不合格”而消极。并且觉得过去念了书,反倒有罪了。”^①老干部总是对新干部说:“你才参加革命几天,有什么了不起,我革命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呢。”^②新干部不如老干部富有斗争经验是事实,但老干部常抓住这一点,认为新干部“只能‘空谈’,不能‘实干’”,总是歧视、不信任或是看不起他们^③;一旦新干部被提拔到比自己还高的职位,就会眼红、不甘心。有位老干部就曾忿然说:“我加入红军当兵十几年了,到今天还是搞搞团长、营长或是一个团政治部主任,怎样他一来到新四军头一天就拉到我头上当我旅的政治部主任、旅的政治委员?”^④一位新知识分子干部回顾自己在一游击大队工作时的情形:“开始很受老干部的轻视,他们轻视我没有经验,轻视我党龄短,轻视我是个知识份子,不满意我提升的这样快。”^⑤

工农老干部骄矜自傲、瞧不起知识新干部是一面,自卑、认为自己不如新干部则是另一面。不管是新干部大量增加,还是新干部被提拔,他们总认为是“老干部吃不开了”的表现。特别是“精兵简政”被提出后,大批老干部被调出学习,新干部则充任到基层和连队,使得老干部特别不满“精兵”政策,总是说:“咱们不行啦,你们来吧,你们都是顶呱呱”,“老干部吃不开了,老干部完了,把部队交给新干部吧”,“现在是新干部的天下”,其中颇多牢骚,甚至有的还蒙头大睡,流泪诉苦。不少老干部害怕上学背粮与规律的生活,不愿住学,认为住学是受苦。有的说:“就是去掉十一年的光荣传统也不住学”,“打死也不住学”;还有的说:“住学就是判了两年刑”,甚至还有因怕住学而开小差的情形。^⑥

与老干部说新干部“无经验”、“空谈不实干”相对,新干部认为老干部工农出身,没有文化,是“老粗”、“土包子”。一些人会向老干部挑衅说:“你过来,我和你谈一谈马列主义,你懂吗?”^⑦还有一些人认为自己“大方”,老干部“小气”,自己是“思想自觉来干革命的”,老干部是“为土地、为自己的好处才来革命的”。^⑧

除了资历和成分,职位和生活待遇上的差别也会导致新老干部间的冲突。工农老干部一般占据上层军政要职,新知识分子干部则多从事下层政工和宣教等工作,这使得新、老干部在物质待遇上有着显著的差异。按周文青观察,“老干部们都是盘踞要津,没有钱也可向有钱者‘打游击’(私人活动金钱物质)。这个还不算,上级还另有特别津贴,如‘保健费’、‘秘密补助费’等。”^⑨新老干部间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候,曾不断发生“老干部组织集团反对新干部,新干部亦组织集团反对老干部”的现象。^⑩不过,矛盾冲突多发生在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干部与工农出身的老干部之间。新知

① 王林:《抗战日记》,解放军出版社2009年版,第89页。

②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181页。

③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1943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917页。

④ 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6月8日),《新四军·文献》(2),第856页。

⑤ 《检查自己的思想与工作》,《思想反省选集》(1943年2月),山西晋城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73页。

⑥ 《第一二九师政治部组织部关于一九四二年组织工作总结(节录)》(1942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737页。

⑦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181页。

⑧ 《干部要严格要求自己》(1942年10月7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257页。

⑨ 周文青:《中共三五九旅的断片》,《文化导报》第4卷第6期,1943年,第33—34页。

⑩ 《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关于一九四〇年干部问题的总结》(1941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392页。

识分子干部与老知识分子干部的关系一般是比较好的,因为后者“对知识份子的特点有较深的体验,能在工作中很好地去掌握与运用知识份子”。与此同时,新知识分子干部在老知识分子干部面前“没有什么可以自高自大的地方,都很虚心的向他们学习”。^①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共军队内部只存在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间的矛盾。即便在老干部与老干部之间,矛盾冲突也无法绝对避免。特别是当一些老干部得到升迁,而另一些有着同样资历和年龄的老干部未能得到升迁时,牢骚、不满、冲突便会随之而来。这一点在新知识分子干部间也是如此。有人就表示,“看到曾在×校受训的许多同学与学生都当什么什么了,以及某些历史比我还短的同志,我以为能力党性都不及我的同志的职位比我高时,我非常恼气!以为自己太落后了!”“特别是受到过去在×校受训的同学或学生冷待时,我就联想到大概是因为我的职位不高,没有牲口,没有勤务员等等,所以就‘吃不开’。”^②

其实,在任何组织内,年龄、经历、职位、文化层次等差别所导致的矛盾冲突都难以避免。中共军队内的一些矛盾冲突亦符合常情。只不过,很多冲突被掩盖在阶级话语的表述之下。在这些矛盾中,新老干部的问题往往跟知识分子与工农、军事指挥与政工人员之间的问题相交互杂。但在众多交杂的矛盾中,“基本的还是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互不相融洽,知识(分子和)工农干部之间互不团结”。^③而“工农干部与知识份子干部的问题”,是新老问题的实质。^④

新老相互攻讦,虽不乏主观意气,却也道出了颇多实情。在工农老干部看来,新知识分子干部由于缺乏经验,工作不熟练,难免幼稚行动或过左过右的偏向,易发生“公式主义”、“条文主义”的毛病,形式铺张、内容空洞,“除了把战士弄得昏头昏脑莫名其妙而外,则没有任何其他的效果”。^⑤他们往往将“平等”视为“平均”,要求略有不遂或待遇稍有不周,就会认为新老干部之间不平等,喜欢“背后议论,乱作批评,甚至夸大事实,搬弄是非”。^⑥他们中有的人“平素生活散漫、随便、马虎、零乱、不严肃,对于完成任务、执行决议不了解其严重性,同时也常常以懈怠的心情去对待。有时,一个任务完成不了,当上级检查时,也不觉羞愧,还‘侃侃而谈,不以为然’。”^⑦罗瑞卿曾总结说,在新知识分子干部中间,“容易出现一些好高骛远,自命不凡,平均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不惯于过组织生活,不惯于遵守纪律,感情用事,观察问题的片面性,对待工作欠坚持,在顺利的革命形势中往往会‘左’得发狂,但稍受挫折却又容易灰心丧气……等等的不良倾向。”^⑧由于他们多从事政治工作,当他们把这些不良倾向带到工作中来以后,致使官僚主义、纪律败坏、贪污腐化等问题频发,“不仅不能成为模范,而且玷污了政治工作人员的崇高称号”。^⑨

① 《晋察冀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关于知识分子干部工作问题》(1943年8月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下册,第917页。

② 《反省两年来的错误》,《思想反省选集》(1943年2月),山西晋城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28页。

③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72页。《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收录该文时将时间订正为“1944年6月15日”。

④ 萧华:《关于干部问题》(1940年4月3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干部工作历史文献选编》第1卷上册,第303页。

⑤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194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476页。

⑥ 罗瑞卿:《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1939年3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1939年3月15日,第49页。

⑦ 郭峰:《关于加强知识分子干部修养的几个问题》(1939年7月19日),《冀西民训处与冀西游击队》,第375页。

⑧ 罗瑞卿:《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1939年3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1939年3月15日,第47页。

⑨ 《罗瑞卿在北方局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1940年10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5册,第456页。

不过,有些老干部对新知识分子干部的批评和态度未必有当。赵毅民曾指出过5种对待知识分子的“不当”观念和态度:(1)认为一切知识分子应同党员一样坚定、守纪律、吃苦耐劳,当事实与这种观念不符时,便对知识分子发生厌弃、不愿接近的心理;(2)认为只有已经入党、能够入党和愿意入党的知识分子才是对革命有用的,否则,都是“无用的”或“无大用的”,对“无用”或“无大用”的知识分子不是冷淡,就是嘲笑;(3)过分强调知识分子无组织、无纪律、个人主义,并认为这些是绝对不可救药的坏习惯,以致忽视甚至放弃对他们的教育;(4)认为有复杂社会关系或家庭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一定存在问题,不是看不起他们,就是害怕连累自己,对他们总是拒而远之;(5)总是将知识分子与敌人和资产阶级政党派来的奸细联系在一起,有意无意地疑惑、恐惧与厌弃他们。^①

另一方面,老干部被新知识分子称呼为“老粗”、“土包子”,也并非全无缘由。他们大多文化水平低、理论知识弱,“有一肚子的实际经验,但是讲不出来,写不出来”。^②也因为他们自己存在这种局限,害怕同新知识分子接近,不但不佩服他们,反而“怀着知识分子只会吹牛皮,打起仗来、作起工作来就不行等等成见”。一些老干部也确实有所谓“摆老资格”的现象,“自以为斗争历史长,工作经验多,劳苦功高,目空一切,对于新干部不是亲近他们,帮助他们,而是以傲慢态度去对待他们,轻视他们”。在工作方式与方法上,喜欢简单化、直线化,常使新干部觉得他们“太严肃,太冷淡,太简单,太硬性,甚至感着太老大,太傲慢,于是乎觉得不好亲近,也就不愿亲近,好一点的则敬而远之,差一点的则引起反感。”^③一位新知识分子干部曾公开说:“我们军队中只有师以上的干部才是布尔什维克,团旅级的干部特别是团一级的干部,大都不讲道理,摆架子,许多事情明明自己不懂,硬要下级服从他们!”^④

此外,工农老干部因长年的战斗经历和残酷的战争环境,厌倦、失望等情绪时有发生,甚至大量逃亡。据统计,1942年整个新四军“团、营级老干部逃亡堕落的计四十余人,这是极为惊人的数目”。^⑤除了逃亡,老干部“想钱用,想生活好,要求打补药针,想讨老婆的也很多”。如果想要的东西得不到,就说:“这革命还革什么呢?”^⑥所有这些,自然让老干部的“坚定性”、“革命性”在新干部面前大打折扣,让新干部觉得他们也不过如此而已。

应该说,老干部确实比新干部更富有实际经验和纪律意识,“他们的长处,是新干部望尘莫及的”。^⑦而新干部则更具文化水平。据陈毅后来总结,当新干部参加到实际工作中来以后,“政治工作活泼生动些,晚会上的花样多了,报告也满流利。过去连马克思的像也画不像样子,现在能画像样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内容丰富了,不是土气,而是洋气。”^⑧秦基伟回忆自己任太谷游击支队司令员的时候,让警卫员买一只鸡炖了吃被部队中的知识分子批,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了也被他们批,批得他“直想发火”,即使自己表面“板着脸,卡着腰,一幅威严的样子”,但“心里是有压力的”。不过,即便如此,他觉得知识分子“有文化、有思想、有朝气、有热情”,从心眼里敬重他们。知识分子也因为“我是老红军”,“对我的胆量和魄力也服气”,“从骨子里还是尊敬我的”。^⑨

总的来说,新、老干部由于时代与斗争环境不同、出身与生活习惯不同、知识与能力不同、政治

① 赵毅民:《反对恐惧与排斥知识份子的现象》,《共产党人》第3期,1939年12月25日,第6页。

② 陈云:《关于干部队伍建设的几个问题》(1939年12月10日),《陈云文选》第1卷,第181页。

③ 罗瑞卿:《新老干部更紧密的团结起来》(1939年3月2日),《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卷第3期,1939年3月15日,第49、48页。

④ 《反省两年来的错误》,《思想反省选集》(1943年2月),山西晋城档案馆藏革命历史资料,第27页。

⑤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夏),《陈毅军事文选》,第266页。

⑥ 黄克诚:《第三师与盐阜区工作报告》(1942年2月),《新四军·文献》(3),第423页。

⑦ 王林:《抗战日记》,第89页。

⑧ 《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1947年12月30日至1948年1月1日),《陈毅军事文选》,第434页。

⑨ 《秦基伟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版,第92—94页。

修养与条件不同、职权与生活待遇不同,难免发生隔膜、分歧和矛盾。他们在日常生活工作中,“较量长短,发生分歧,不是政治上的自大,即是军事上的横蛮,一个讽刺一个,一个挖苦一个”。^① 尽管这不是当时中共军队干部生存状态的全貌,但确实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

四、结论

抗战时期,中共军队的急速扩张带来了干部缺乏的问题。军事干部多通过战斗提拔得以补充,政工干部则因需具备一定的书写表达能力,多依赖于当时涌现的“新知识分子”。但受资历和经验等限制,这批“新知识分子”在整个军队干部队伍结构中多居于执行和贯彻政策的层级,并未占据军政要职。这就使得“新知识分子”在解决军队建设所面临问题的同时,又产生了新的问题,那就是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的矛盾冲突问题。

面对新的问题,中共提出了“工农分子知识化”和“知识分子工农化”的解决办法,其中最重要的举措就是让工农老干部入校学习,将新知识分子干部充实到基层。这在教育、提高老干部,锻炼、铸造新干部的同时,也让新老干部之间保持了一定程度的分离,进而逐渐磨合与调适。更重要的是,不管是工农干部还是知识分子干部,中共不再仅仅从录用上做文章,而更为注重通过教育(包括入校教育和实践教育)的方式来进行平衡和控制。此外,军队在行军作战的同时,也进行了“整风”和“审干”的工作。当时党外有人断言:“整风审干”意味着“‘党’的智识份子干部与农民干部矛盾尖锐化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② 反向而言,正是因为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之间存在矛盾,才需要借助“整风审干”等手段来加以解决。整风既要“把知识分子的面目弄清”,也要让“工农干部坦白”,“暴露他的弱点”,“克服他的军阀残余”。^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整风审干”在党内军内不同层级有不同的针对性和不尽一致的运作。至于所有这些解决矛盾的办法如何实施,在实施过程中存在怎样的问题,解决的效果又如何,拟另文详述,此处暂且不论。

从中共干部任用政策看,与红军时期不同,抗战时期中共中央高层一再强调要吸收知识分子、培养知识分子干部;在具体做法上,抗战时期对知识分子更多采用的是“整风学习”的方法。这种差别,与其说是中共在不同时期实践阶级话语的刚柔之别,不如说是话语与实践互动的不同体现。不可否认,红军时期,中共生存空间小、受共产国际影响大,所以才会在干部任用上有着“唯成分论”的教条主义倾向。中共的意识形态强调工人成分,而实际的生存环境在农村,所谓“工农干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农民干部。中共在表述上不提农民干部,也不单纯提(产业)工人干部,只笼统提“工农干部”,实是阶级话语因具体实践而调适的表现。抗战时期,话语与实践的互动更为明显。作为“原教旨”的阶级话语常被视作原则拿出来强调,有时亦作工具性的运用,并随具体实践而调整。“新知识分子”被大量吸纳进军队干部队伍,主要是为了解决政工干部缺乏的困境。但中共却巧妙地将之掩盖在了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话语表述下。其实,统一战线并非唯一目的,而更具革命策略意味。它为吸纳新知识分子创造了条件。中共将“阶级”的话语表述转化为“民族”的话语表述,恰恰也是对现实的因应。“新知识分子”受知识能力、年龄资历等因素的作用,多从事军队下层政治工作,不能占据中上层军政要职,这更多是科层结构的正常反映,而非简单地在意识

① 《在山东军区军工会议上的总结报告(节录)》(1944年10月1日),《罗荣桓军事文选》,第272页。

② 江砥:《智识干部与农民干部——中共党内矛盾之一》,《民族正气》第2卷第5/6期,1944年,第61页。

③ 中共镇江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中共句容县委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委员会编:《汪大铭日记(1939—1945)》,1987年印行,第375页。

形态作用下受挤压的结果。新知识分子干部与工农老干部之所以产生矛盾冲突,也不仅仅是阶级成分的区隔带来的,而是知识、代际、职位、待遇以及生活习性等差异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共高层也更多是在两类干部中寻求平衡和进行调解。在知识分子干部较多的部队强调提拔工农干部,在工农干部多的部队则强调提拔知识分子干部;一方面要求工农干部知识化,另一方面要求知识分子干部的工农化。只不过,在一些表述上,中共仍无法完全摆脱阶级话语的窠臼,仍时常批评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意识”。这一方面是人为造成的一种阶级对立,另一方面又模糊了矛盾的实际缘由。

新老干部对立在华中根据地颇为严重的时候,中共的处理办法是:“初期决定以老干部为基础来使用和提拔新的,第一步即营、县两级以上均保持老基础,让新的到连和区、乡去锻炼。第二步逐步开放营、县两级,而团级则仍紧握着保持老基础。现在已进到第三步,便是团、县两级也必须大大开放,但军事指挥权(团长)和政治领导权(政委)仍必须是尽先补用老干部,新的则只让他们作政治处、参谋处工作。”“特殊情况下亦承认和使用破格用人的原则,就是说遇着新干部中某几个特别优秀的亦破例提拔,加以培养。”^①这也说明,中共并没有完全按照阶级话语的原则,一味地倚重工农老干部。虽然陶铸在抗战时期曾主张,连队指导员的选拔标准不应该是“有文化程度,能够看文件,写报告、总结与上政治课和文化课”,而是要有“充分的群众气质,强烈的阶级感情,艰苦、朴素,有社会经验”^②,但这与红军时期反对知识分子充任政工人员仍然有极大差别。

引申而言,正是从互动的角度,才能理解中共阶级话语与具体实践之间的矛盾和张力;才能理解中共一方面强调知识分子的依附性、革命不坚定性和小资产阶级属性,一方面又强调其知识技能对于军队建设的重要性。黄道炫在论述红军时期中共干部成分时谈到,中共对知识分子在革命中的地位有一种“缘于阶级分析的担忧”,这种担忧在不同时空始终存在,区别只在于“政策执行中的刚性和柔性而已”。^③此论不无启发。不过,其背后的逻辑依然在于,中共师俄而来的那套阶级话语始终是高悬的原则。翟志成正是在这种逻辑之下,将1921—1949年中共对待知识分子的方式概括成了一个从“完全依赖”到“组织整肃”、“肉体毁灭”、“思想改造”的单一链条。^④但实际上,在复杂的情势面前,阶级话语一方面充当了原则,另一方面也充当了工具。^⑤

[作者谢敏,北京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北京,100871;指导教师王奇生,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胡永恒)

① 《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三年华中工作总结报告》(1944年夏),《陈毅军事文选》,第267页。

② 陶铸:《从十个连队调查材料中所看到的关于连队政治工作改造的几个问题》(1944年2月27日),总政治部办公厅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历史资料选编》第7册,解放军出版社2004年版,第409页。

③ 黄道炫:《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1933—193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01页。

④ 翟志成:《中共与党内知识分子关系之四变,1921—1949》,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23期下,1994年。

⑤ 裴毅然对抗战时期投身中共革命的知识青年的学历构成、知识结构的分析,以及其对五四以后、特别是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干部间矛盾的梳理,对本文不无启示。裴毅然:《延安一代士林的构成及局限》,《社会科学》2013年第3期;裴毅然:《当代中国工农干部与知识分子矛盾的由来与后果》,《当代中国研究》2007年第2期。